

評 論

瀨川昌久，《客家：華南漢族的族群性及其邊界性》（河合洋尚、姜娜譯、蔡文高校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1993〕。173 頁

連瑞枝*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本書是瀨川昌久學術專著《客家：華南漢族のエスニシティーとその境界》（風響社 1993）的中譯本。瀨川昌久教授是一位文化人類學家，畢業於日本東京大學，目前是日本東北大學文學研究科的教授。他的研究主要在於華南漢族與地域社會。本書是他的第一本學術專著，1995 年獲得日本文化人類學界頒給年輕研究者的澀澤獎，學術評價甚高。後來，他陸續出版了《族譜：華南漢族的宗族·風水·移居》（錢杭譯 1999）。近年來，與飯島典子合編《客家の創生と再創生：歴史と空間からの総合的再検討》（風響社 2012）等書，延續了他對於地域社會中漢族多樣性的研究旨趣。廣東嘉應學院提出了「海外客家研究譯著」的計劃，將海外客家學術研究進行翻譯，重新將此作品介紹給中文學術界的朋友，此書雖然已出版 20 年，但中譯本的出現，將有助於中文學界了解此議題曾經被深深耕耘過的情形。

本書主要從族群邊界人群互動的角度出發，對 20 世紀 80 年代以前客家研究的主流論述提出討論。自 20 年代以來，羅香林等學者從歷史源流的角度建立了一套客家研究的典範，進而形成一套客家人的歷史論

* E-mail: sophie0502@gmail.com
投稿日期：2014 年 7 月 10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 9 月 22 日
Date of Submission: July 10, 2014
Accepted Date: September 22, 2014

述。然而，瀨川昌久在香港與廣東省內客家地區從事田野考察之後，發現客家認同的地方差異性很大，許多客家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客家意識是「曖昧的、模糊的」。在此學術前提之下，這本書問題意識便是試圖要闡明為什麼「羅香林等人眼中的客家自身大多並沒有明確的客家意識？」（瀨川昌久 2013：3 中文序）這樣的學術命題，也促使他著手從族群邊界的角度來探索客家人在不同地域社會中所展現出的多樣性。然而，本書不僅是一本從事客家社會的研究，作者更大的企圖是「通過客家事例來考察人類社會普遍的問題」（瀨川昌久 2013：3 中文序），或是「從基本上重新思考中國南部的漢族文化」（瀨川昌久 2013：116）。換句話說，作者本書不僅挑戰了客家社會靜態單一的面貌，也針對所謂的「漢族文化」提出具有歷史深度的討論。

作者認為族群的邊界是流動的。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其生活之現實性與價值體系的運作使得不同族群的界線與關係處於流動的常態。作為族群最基礎的語言界線往往也會隨著不同時期的移民潮、祭祀活動、經濟活動以及不同世代的教養等等而有不同程度的流動關係。香港歷史條件以及移民的特質，也使得此一研究取徑別具意義。除了採用邊界人群的概念作為客家研究的討論架構以外，作者主要的貢獻在二方面：一其採用流動的、辯證的族群關係來討論客家社會的流動性與邊界性，更進一步指出所謂的漢族／漢人社會這樣的研究概念也存在著既有的限制。所以，漢族／漢人研究也需要更留意與非漢人群的互動關係。二、指出過去對於客家社會靜態的、一致性的形象需要受到修正，應該賦予其更多動態的、建構的社會自主性層面的討論。

本書主要分為五章。第一章是定義研究對象與架構。第二章是從香港新界的個案來討論地域社會中的客家。第三章是客家族群的歷史性開展。第四章是介於漢與少數民族之間的選擇。第五章討論客家認同感與

歷史意識的形塑。

首先，作者針對學界如何運用「民族」、「民系」或是「族群」的概念進行討論。他認為「民族」與「民系」的概念過於機械化，這些概念使人無法理解人群身處的社會場域與脈絡，也無助於群體意識認知層面的釐清。為使田野中客家社會的多樣性以及主觀性認知得以操作，作者採用了族群邊界的概念，從界線維持的動態性來談客家和鄰居的關係，甚至是進一步討論客家意識如何產生的過程。

第二章〈地域社會中的客家〉討論香港新界族群關係的消長。作者認為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香港族群關係改變重大。戰前的香港內部已有複合式的方言群，包括了本地、客家與福老人等社會分類的概念。其中，香港新界原有本地與客家二種不同人群，但是隨著戰後，大量移民移入香港，尤其是潮汕人大量湧入，使得原來不同的人群：本地與客家，反而成為原住民，與包括潮汕人在內的新移民形成二種不同分類概念。作者特別指出，這種情形在二戰後大規模的移民流入香港社會，同鄉會、同業會等等為了謀取共同利益的組織開始產生起來，尤其當具有競爭性的潮汕移民勢力愈來愈強大時，客家與潮汕二種人群的界線才逐漸被強化。再者，戰後移入香港的客家人並沒有和原來的客家人形成相互認知的群體。也就是說，同是客家方言群之移民，因為移入時間不同，彼此間並不認為是同一類人。相對地，作者認為隨著新市鎮的發展，一些不同方言群的新移民必須學習具有主導性的古村落客家方言，而產生客家化的傾向（瀨川昌久 2013：51）。其它的因素，像是世代轉變以及教育中大量採用廣東話教學等等本地化過程，也會削弱或模糊正在形成的族群邊界。再者，在生計方面，雖然香港本地人多集中在較低的平地，客家人多居住在丘陵地區，但隨著外來移居者愈來愈多，二者紛紛將農地租給新來的移民，致使二者在生計上無大區別（瀨川昌久 2013：

40)。較大生計上的區別則是潮汕新移民與原住民（即本地人與客家人）二者之間。此外，一般以為祭儀活動可以作為族群文化的標誌，作者也指出該地之祭儀活動無法清楚地作為分辨族群的必要條件。在此章之最後一節，作者試圖用婚姻法則來檢視客家二代人之網絡時，發現 S 村之上一代，確實採族群內婚，但在下一代則跨族群通婚愈來愈頻繁（瀨川昌久 2013：49）。

第三章作者以〈客家族群的歷史性展開〉進一步走到深層人群內部歷史經驗，試圖討論本地人和客家人二組人群透過什麼媒介並且如何維持二種人群的界線。作者認為族譜是一種標誌人群差別的重要文獻，清楚地顯示出兩大群體在遷徙路線上有明顯的差異。其中，本地人的族譜內容記載著他們是宋到明初之間遷居到珠江三角洲，並以東莞作為祖籍地，明中葉至清初再移居到香港。而客家人的族譜內容大多記載著他們的祖先從明中葉時期由福建、廣東梅縣移入惠州，清初移居香港。造成族群認同差異性的原因，其一在於移民香港之前，前者在珠江口，後者在韓江、東江流域所受地方文化的影響不同，其二在於清初遷界令解除之後兩大群體大規模的相遇。而在此之前依客家遷徙路線來港者，他們是透過通婚等方式融入本地文化之中，並沒有強烈的客家認同。再者，地方上的方言群往往呈現了光譜的效果，香港新界地區的本地人和客家人二者交界之區的語言是圍頭話，形成「本地文化－圍頭話－客家文化」的語言分類的效果。最後，作者也試圖從其它地區之語言現象，來說明這種融合性，包括了東莞與深圳附近之客家村落，甚至是梅縣等純客地區，臺灣之屏東與彰化平原等等，發現很難用福老、客家的二元概念來劃分民系。

那麼，社會衝突發生的原因是否來自人群分類呢？作者分別以清治時期之珠江三角洲以及臺灣社會動亂（朱一貴事件）來說明客家與周遭

人群的關係。清治官府往往以不同人群之間的恐怖平衡來維持其治理的優越性，但海外的資金以及鄉勇的暴力性組織會強化人群之間的緊張關係。相對地，香港新界因為土地關係的特色，突顯的不是族群關係的緊張，而是地主與租佃、大宗與小宗等等階層性的衝突。也就是說，客家社會在遷徙模式的複雜性、市場化條件的機制，加上因地制宜的條件，使得某些地方的客家社會擁有較強的「自我意識」，有的地方則顯得更易於和不同人群融合，而產生自我意識模糊的情形。

留在「原鄉」的客家人和畚族之間的界線也值得討論。第四章作者以〈漢族／少數民族的界限再考〉打破了漢族內部不同民系的架構，試圖從鄰近的畚族社會來討論客家和畚族二者之間的模糊關係。同樣地，畚族和客家人在生活領域上非常靠近，但他們祖先來源論述非常不同。過去由於文化貶抑之故，畚族之自我認同意識非常薄弱，產生了漢化與客家化的情形，但隨著國家政策對少數民族的優禮，畚族之自我意識也逐漸清楚，他們不斷地以祖圖來標誌其族群特徵，以區隔和客家人的差異。但是，作者卻指出，畚族之親屬集團的結構與神明崇拜與漢族沒有顯著的差異，他們雖然宣稱有自己的畚話，但畚話與漢族的客家方言相近。此外，沿海的疍民也有類似的特質。瀨川昌久在第四章試圖說明在少數民族政策下，即便已經接近同化的人群，也會因為政策鼓勵差異性而產生區辨性的認同。

那麼，如何解釋客家意識中「強烈的正統感」呢？第五章作者以〈客家的認同感與歷史意識〉為題，回到層面較廣的學術討論，也是他在題目中所提示的：客家事例的討論究竟給漢族研究帶來什麼樣的啟發呢？作者提出了南方不同民系的人群是透過不同的祖先傳說來創造他們的「歷史」並以此作為我類的合理性基礎。客家「強烈的正統意識」主要是因為他們較晚移入中國南方，部份的晚到移入者以代表漢正統的系

譜關係來區別他們和土著的差異，同時也用來宣稱或強化外來／晚來且居住在山區貧瘠土地時身份的優越性。也就是說，土著性和外來性並不足以作為本地民系和客家民系各自固有的屬性，它們只是作為漢族周邊地區的漢族文化居民共有的自我意願的兩個極端（瀨川昌久 2013：133）。那麼羅香林用來論證歷史事實的族譜，在瀨川昌久的分析中，也就成為具有分析意義的檔案，從這些檔案建構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民間集體如何創造、實踐他們的自我認同。作者甚至指出了族譜此文類形式大量的出現，呈現的是一套「客家民族主義」知識系統在建構。不只是客家人，本地人也捲入了此一系統的書寫，形成「從連帶意識出發的一種杜撰」（瀨川昌久 2013：145），本地人也出現祖先源自於南雄的傳說。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皆有類似的情形，如雲南大理民家的南京傳說，壯族對宋代狄青的祖先認同等等。作者揭露了一個更貼近人群與社會實相的可能性，即邊境人群透過族譜來論證其自我認同，而族譜內容是人群對過去的創造。

最後，作者參照了學者華德英（Barbara Ward）對香港疍民自我意識來說明客家人如何形塑正統感，並指出：流動性高又分散居住的客家人，他們雖然和理想模式的漢族大傳統結群生活方式有所差異，但他們仍然保有高度的趨近性，主觀地認為他們表現得和文人傳統一樣。正是此等高度的自我意識使得「系譜認知」也成為他們表達自我認同的重要表徵。值得注意的是，系譜認知，不只是一般所說的客家人具有更強的父系價值或傳統，而是客家人更強調了族譜此文類的架構，作為其人群自我意識的合法性基礎。這也預見了作者下一本從族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企圖。

瀨川昌久此書的重要性與貢獻可分以下幾點來說明：一、從族群邊界的角度來談客家社會，突破羅香林以來視「客家人」為有清楚定義、

不證自明的人群。相對地，人群流動以及界線的維持成為討論族群的重要議題。二、作者從文化人類學的研究視角，觸及了中國南方社會形成以及族群歷史性議題的討論。客家分佈範圍相當廣，書中隨著香港新界，延伸到大陸以及臺灣客家地區的相關討論，可看出作者重視客家人在不同地方的歷史經驗，而族群界線的形塑也隨著不同地方呈現差異性。也因此，藉由客家事例的研究深入華南地區人群互動的多樣性，使得討論的層面擴及南方漢族文化形成的建構性問題。三、作者並不因族群的流動性而認為客家是虛構的。相對地，他提出系譜認知的概念來說明南方不同民系在面對外在世界的改變之時，如何創造他們的歷史敘事。也就是，作者將「族譜」視為族群自我認知與區辨異己的創作與學習。當學術研究者皆以考證的態度處理族譜之偽造時，瀨川昌久之重視族譜此文類，更顯得其對民間地方歷程與集體心志所採取之同情式的理解。接下來的學術作品《族譜：華南漢族的宗族·風水·移居》（錢杭譯 1999）也正可說明了此研究議題的再延續。

此書在 20 年前便已出版，其論說之新穎以及當時之學術代表性自不待言。近 20 年來，不論是族群理論的討論日益熱絡，華南地區族群相關歷史人類學研究與討論也相當豐富。在這樣學術發展脈絡下，本書與相關概念更應提出來進行深入的探討。作者提出以地域社會的微觀視角來從事族群相關的研究，在第一章便提出深入漢人研究的學術企圖，甚至進一步地想要重新檢視「漢與非漢」界線的討論，並提出了「東南中國正式開始漢化之前，漢族文化就已經具備多樣性」（瀨川昌久 2013：115），或「在學術上真正理解中國東南地區地方文化多樣性」。在這裡，「漢」究竟是什麼樣的概念呢？在什麼意義上存在著我們大家都能夠理解的漢族呢？作者的論證似乎是指涉了人群透過參與系譜知識架構，來說明漢族／非漢的形成。那麼我們怎麼理解「地方文化」？作

者在書中不斷提出所謂的「地方文化」或是地方性的概念，意味著流動人群融入本地人社會的自然可能性。但對於地方文化的參與如何轉變成為作者逐漸論證的「祖先」系譜認知的區域特色？人們日常生活中對地方文化的生活感的重視，如何逐漸轉變成為以歷史認同為支配的系譜認知，也是此書潛在的一個重要議題。

換句話說，「系譜認知」如何放在歷史過程中來討論呢？系譜是一種具有現實性的知識體系，它將人群帶往具有意義的時間關係之中，提供了行為的合法性基礎。它是傳統，也可以是一種再建構的過程。系譜的型式也並不僅只於文字，還可以透過口傳、儀式等等的方式來展演。它的內容可能是神的系譜，也可能祖先的系譜或是宗教儀式專家的系譜。彼此之間是相仿的、併存的，也可能產生競爭的，這種依附在不同性質系譜的時間感也與整套歷史文化所試圖創造的持續不斷的延續性有關。那麼，我們不禁要問，這整套以祖先歷史敘事為主的系譜知識是如何被接受的？這種來自於地方人群的歷史建構以及文化策略，也成為近 20 年來學術界的一門重要的新課題。他的研究令人想起 Benedict Anderson《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中有關民族國家如何透過媒體創造出既虛幻又真實的集體共同感。當然，其研究也導向進一步的問題，即「系譜」此文類的創造、傳播與接受是如何形成的。

終歸來說，此書的貢獻不僅提出族群邊界的概念來解釋客家社會的形成，同時也帶動了相關議題的可能性，不論是區域歷史、族群互動、方言群以及系譜認知乃至於重新檢證人群歷史意識的建構討論等等。近 20 年來，臺灣學界對客家歷史與相關議題的討論相當豐富，中國大陸華南學派所倡議之歷史人類學相關研究論著中也提出不少重要的論著。這些也可說是受惠於族群議題的討論，促使我們回到歷史中試著重新找尋另一種書寫歷史的新視角。

參考文獻

- 瀨川昌久，1993，《客家：華南漢族のエスニシティーとその境界》。
東京：風響社。
- 瀨川昌久著、錢杭譯，1999，《族譜：華南漢族的宗族・風水・移居》。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瀨川昌久、飯島典子，2012，《客家の創生と再創生：歴史と空間から
の総合的再検討》。東京：風響社。
- Anderson, Benedict (班納迪克·安德森) 著、吳叡人譯，1999，《想像
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出版。
- Ward, Barbara. 1965, "Varieties of the Conscious Model: The Fisherman of
South China." Michael Banton ed., *The Relevance of Models for Anthro-
pology* 1: 113-137.

